臺大中文學報　第五十期
2015 年 10 月　頁 77～116
臺 灣 大 學 中 國 文 學 系

# 從八十年代初香港作家的中國遊記論本土的身份認同

## ——以《素葉文學》為例

王　家　琪*

## 提　要

八十年代初因應中國開放觀光旅遊，大量的中國遊記伴隨不少思考中港關係的小說湧現香港文壇。研究這批文本令香港文學久經鞏固的本土本位思考顯得過份簡化，本文欲重新提出「中國性」如何與本土認同構成複雜的關係。現有相關研究稀少，回到刊物現場整理這段時間的文壇面貌是重要的第一步。本文以八、九十年代香港非常重要及具代表性的純文學雜誌《素葉文學》（1980-2000）以及素葉同人的結集書籍（不限於素葉出版社）為考察範圍，整理其上各種形態的旅行文本，借用文化身份理論及旅行理論，企圖解答以下問題：旅行所引發的身份認同的反思和流變；香港如何想像和理解中國，所呈現的中國圖象在華文文學同類題材的文本中有何特色；旅行文本如何反映本土

本文於 104.04.29 收稿，104.10.15 審查通過。
＊香港中文大學中國語言及文學系博士生。
DOI：10.6281/NTUCL.2015.10.50.03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和旅行的關係。由此嘗試修正香港文化論述的「去中國化」傾向，重新展現晚近本土概念狹隘化之前香港作家的文化版圖。

**關鍵詞**：《素葉文學》、旅行文學、香港文學、中國性、身份認同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 China Travel Writings in Early 1980s Hong Kong and Cultural Identity: A Study on the *Su Yeh Literature*

Wong Ka-Ki*

## Abstract

As mainland China opened up tourism in the 1980s, numbers of travel writings were published with novels re-think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hina and Hong Kong. The article proposes the Chineseness in Hong Kong literature has a complicated relationship with local identity. As there are few relevant studies, it is important to comb through the journals during the early 1980s. The article analyzes the various kinds of travel writings in this journal *Su Yeh Literature* (1980-2000), a representative literary magazine in Hong Kong. It explores the changes of Hong Kong writers' identification and tries to answer how Hong Kong writers imagine and interpret China, how the features of China's image in Hong Kong literature differ from those in sinophone works that have the same themes, and how travel writings reflec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local culture and traveling. Thus it revises the de-Chinesenization of current academic studies and reconstructs Hong Kong writers' cultural domain before the concept of local culture narrowed down lately.

***Keywords*: *Su Yeh Literature*, travel writings, Hong Kong literature, Chineseness, cultural identity**

* Ph.D Student, Department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 從八十年代初香港作家的中國遊記論本土的身份認同

## ——以《素葉文學》為例

王　家　琪

## 一、導論：本土與旅行、香港與中國

1949 到 1978 年間，香港與中國大陸幾乎完全隔絕，1954 至 1977 年間到中國旅遊的人只有十萬。然而大陸開放後，單是 1979 年就有超過二百萬人湧到中國揭開其神秘面紗，[1] 這年出現了壯觀的回鄉探親熱潮，香港人攜同大量家用品與金錢「衣錦還鄉」，[2] 中國旅遊業也突然勃興。[3] 因應這股中國旅遊熱潮，大量的中國遊記伴隨不少思考中港關係的小說湧現香港文壇。現有香港文學史很少記載八十年代初的「中國熱」文學現象，[4] 稱「文學現象」，是因

---

1　《香港年鑑 1980》（香港：華僑日報，1980 年），第二篇，頁 58。

2　林行止：〈「滿載回鄉」潮的聯想〉，原刊《信報》1979 年 2 月 2 日。載林行止著，駱友梅編：《香港前途問題的設想與事實》（香港：信報，1984 年），頁 83-84。

3　1979 到 82 年間香港的中國旅遊業暴起及熱潮稍微回落後的困難，請參考艾羅倫：〈回鄉熱與旅行社的困難〉，黃思奇等著：《香港社會剖析》（香港：廣角鏡出版社，1984 年），頁 150-155。

4　就筆者所見，有幾篇文章曾提及「中國遊」文學現象，附記於此。（1）馮偉才：〈序〉，《香港短篇小說選 1984-1985》（香港：三聯書店，1988 年），頁 2-6，區分了當時的兩類主要作品：思考香港文化身份的，以及不以香港為背景、通過非香港人思考文化身份。（2）李瑞騰：〈八十年代香港的新詩界〉，《亞洲華文作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為短短幾年間，香港出現大量相關旅遊資訊和遊記，數量驚人，而且具歷史、社會、文化、文學等方面的分析價值。「中國熱」一方面反映在報刊園地及書籍出版上，也反映在文學比賽上。創立於 1972 的青年文學獎首十屆參賽題材主要圍繞中國，包括懷鄉、旅行、新移民等。[5] 而據黃康顯的統計，光是 1982 至 1985 年間，香港作家就出版了三十三種遊記（這數量尚未包括不可勝數的旅遊指南），其中有暢銷至重印七版、九版者，相對於香港其他純文學書籍的出版，簡直是聲勢浩大的新興書種。[6] 其中較為人熟知的作者是較早開始寫中國遊記的南來文人，例如曹聚仁、易君左、黃蒙田等；八十年代初最暢銷的中國旅遊作家則有夏婕、曾展強、水禾田等人。[7] 由於臺灣遲至解嚴後才開放到中國旅遊，[8] 八十年代初香港的相關文本可說是華文文學中獨特的例子，鄭樹森指：

> 香港作家不受戒嚴所限，率先漫遊中國，也是最早通過小說藝術來過濾三十年分離經驗，如辛其氏一九八〇年的〈尋人〉（見洪範版《青色的月牙》）。大陸的開放，也讓鍾曉陽的〈翠袖〉能夠初步呈現中、港的情意轇轕（見洪範版《流年》）。[9]

家雜誌》第 27 期（1990 年 12 月），頁 94。（3）陳智德指八十年代香港作者往往是同時關注香港和中國。陳智德：〈導論〉，《解體我城》（香港：花千樹出版社，2009 年），頁 26。

5 王良和分析了余光中、黃國彬等善寫民族風物與感情的新古典美學詩人入主詩獎評審對參賽作品帶來的影響。參考王良和：〈青年文學獎與「余派」之說〉，《余光中・黃國彬論》（香港：匯智出版有限公司，2009 年），頁 5-74。

6 黃康顯：〈香港今日的遊記文學〉，《香港文學的發展與評價》（香港：秋海棠文化企業出版社，1996 年），頁 219。原刊《讀者良友》第 17 期（1985 年 11 月），頁 17、19、21。

7 王一桃：〈香港作家的國內遊記〉，《怎樣寫遊記》（香港：現代教育研究社，1991 年），頁 91-114。

8 國民黨政府於於 1987 年 10 月開放探親，據統計，這年年底前有一萬一千多人獲准到大陸探親。侯如綺：《雙鄉之間：台灣外省小說家的離散與敘事（一九五〇－一九八七）》（臺北：聯經出版事業有限公司，2014 年），頁 342-343。

9 鄭所推許的兩篇小說分別發表在《素葉》第 1 及第 3 期。鄭樹森：〈香港在海峽兩岸間的文化角色〉，《素葉文學》第 64 期（1998 年 11 月），頁 20。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香港這時期的返鄉散文、中國遊記和小說非常值得與臺灣的同類型文本作比較，而且香港又是臺灣人初到中國探親旅遊的中轉站，[10] 加上馬華文學的懷鄉書寫，構成一幅書寫中國的文學版圖，尤其港臺兩地的中國遊記有許多可以互相參照之處。然而，香港在這幅版圖中經常被忽略，除了是香港很少學者把旅行產生的文字當作文學來研究，更是因為九十年代以來香港文學討論的「去中國化」傾向。

九十年代以來後殖民論述風靡香港學術界，[11] 香港一直被論者稱為「無根」的「浮城」和對抗「原鄉中國」神話的據點，[12] 中國長期以來主要作為香港恐懼的他者現身論述場域，「本土性」與「中國性」（Chineseness）[13] 之間的微妙關係自然未獲得深入探討。加上文學界為了對抗中國大陸的文學史收

10 當時臺灣人要向香港中國旅行社申請簽證、並取道香港到中國大陸旅行或探親。因應 1987 年的臺灣返鄉探親熱潮，香港中旅社馬上編出供臺灣讀者使用的中國旅遊指南，內載對中國的介紹及探親旅遊須知。中國旅行社總社、中國建設雜誌社合編：《在龍的故鄉：探親與旅遊》（香港：海峰出版社，1987 年）。

11 朱耀偉總結出西方後殖民理論的四個主要方向：「籠統而言，後殖民論述的理論內容可分為以下幾項：（1）批判東方主義：薩伊德（Edward Said）的《東方主義》（*Orientalism*）及其餘波；（2）文化認同：身份認同、族裔散居（diaspora）、中國性（Chineseness）等；（3）對被殖民者的分析：如印度的『下層民間研究小組』（Subaltern Studies Group）；（4）對民族主義的探討：批判狹隘的民族主義。」而香港的後殖民討論則聚焦在「邊緣」、「混雜」、「夾縫」及「第三空間」等關鍵字上。朱耀偉：〈引言〉，張美君、朱耀偉編：《香港文學 @ 文化研究》（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2002 年），頁 3-4。

12 這正是王德威對香港文學的定位。王德威：〈香港——一座城市的故事〉，《香港文學 @ 文化研究》，頁 319-341。另參考王宏志、李小良、陳清僑編：《否想香港：歷史•文化•未來》（臺北：麥田出版社，1997 年），第一章「中國人說的香港故事」，頁 21-94。也斯：〈香港的故事：為甚麼這麼難說？〉，《香港文學 @ 文化研究》，頁 11-29。

13 對「中國性」（Chineseness）和「香港性」（Hongkongness）概念的討論參考史書美：《視覺與認同：跨太平洋華語語系表述・呈現》（臺北：聯經出版事業有限公司，2013 年）。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編，[14] 成就「本土本位」的論述，香港文化與中國接合的若干部份就被迫略去不提。八十年代初的中國遊記卻恰好相反，不妨說是香港文學的「中國性」的最密集表現。這種「中國性」不是指民族主義式的激情或對「根」的迷思，而主要體現為對中國文化的承傳和歷史記憶。在這段現有文學史少有觸及的空白中，藏有當時看來取之不竭的對中國的書寫熱情。在香港文學的發展脈絡中，「五、六十年代港人小說中的家國社會感或許是意念的，八十年代的則往往是『存在的』」，[15] 在當時出版的許多旅遊書上也可以讀到對祖國河山的熱切想望和情感。本文力圖在鉤稽香港文學的「中國性」的同時避免像大陸不少香港文學史那樣把民族主義立場強加諸香港文學之上，[16] 嘗試重構當時本土及民族認同矛盾共存的情況，重新提出「中國性」如何滲透在香港文學的不同範疇，與本土認同構成複雜的關係，正如不少香港史著作形容香港人的國族認同是實用主義式的、多重矛盾的，[17] 拒絕正視香港人的多重身份認同問題，將無法正確詮釋部份文學現象。

旅行文本是觀察香港身份認同的有利視角，「旅行」相當於「本土」的異托邦（heterotopia），把本土意識問題化。旅行作為跨文化比較的行為，[18] 同

14 可參考黃子平：〈「香港文學」在內地〉，《害怕寫作》（香港：天地圖書出版社，2005 年），頁 10-24。陳國球：〈收編香港——中國文學史裏的香港文學〉，載香港中文大學中國語言及文學系、香港教育學院中國文學文化研究中心合編：《都市蜃樓：香港文學論集》（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2010 年），頁 3-21。《否想香港：歷史・文化・未來》，第二章「中國人寫的香港文學史」，頁 95-129。

15 黃繼持：〈七、八十年代的香港小說〉，黃繼持、盧瑋鑾、鄭樹森編：《追跡香港文學》（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1998 年），頁 27。

16 黃子平完整追溯了香港文學進入中國視野的過程和發展，八十年代中以後編寫香港文學史作為國家項目，以「民族——國家」意識為基礎，「強調血濃於水。強調起源、文字、文化、傳統的『同』，淡化流派、政治、地域、現實的『異』。」〈「香港文學」在內地〉，《害怕寫作》，頁 17。

17 參考蔡榮芳：〈結語：「愛國史學」迷思及「民族主義」之曖昧複雜性與危險性〉，《香港人之香港史 1841-1945》（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2001 年），頁 277-278。

18 James Clifford, *Routes: travel and translation in the late twentieth century*,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7), p.110.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時也是經濟行為，七十年代香港經濟起飛後港人愈來愈多到外地旅行，意味著他們可以把香港與其他地方作比較。[19] 在旅行理論上可以找到不少對旅行與本土關係的見解，或者說「在地／外地」、「本土／他鄉」等概念之間的角力和互相闡發，正是旅行理論的基礎。約翰・厄里（John Urry）認為觀光旅遊的成立，仰賴旅遊經驗與日常經驗的對比。[20] 這和異國情調的理論相似，艾倫・狄波頓（Alain de Botton）認為旅人對異地的想像和嚮往深深連繫着旅人與自己國家的比較，異地最吸引旅人之處正是家鄉所沒有的特質。[21] 厄里提到居無定所時難以區分在家與在外，[22] 臺灣的旅行文學學者胡錦媛也指出：「『家』的存在與回歸是旅行的觀念得以成立的前提……」[23] 正是本土身份認同確立，令香港作家在世界地圖上擁有自身的座標，在旅行經驗中有了可與他地見聞比較的定位點，所留下的文本不只告訴我們作者眼中的異地風情，同時也透露作者對自己來自的那座城市的理解。旅行文學充滿離與返、去與留、在家與在外的辯證，旅行主體在理解當地的同時也是對本來居住的城市的比較、思考和反省，由異域風景想起香港風景，由旅遊見聞想起我城的人事種種，是常有的事。換言之，「家」與「遊」看似相對卻密切相關，旅行文學很適合考察「本土」如何在與他地的關係中建立，香港文學的身份認同問題在旅行文學中更清晰地突顯出來。

本文以八、九十年代香港非常重要的純文學雜誌《素葉文學》（1980-2000）以及素葉同人的結集書籍（不限於素葉出版社）為考察範圍，[24] 除了因

19 高馬可：《香港簡史》（香港：中華書局，2013 年），頁 214。

20 （英）約翰・厄里著，葉浩譯：《觀光客的凝視》（臺北：書林出版社，2007 年），頁 37。

21 參考（英）艾倫・狄波頓著，廖月娟譯：〈異國情調〉，《旅行的藝術》（臺北：先覺出版社，2002 年），頁 81-100。

22 《觀光客的凝視》，頁 268。

23 胡錦媛：〈遠足離家——迷路回家〉，《臺灣當代旅行文選》（臺北：二魚文化出版社，2013 年第二版），頁 10。

24 「素葉同人」指曾經出任編務的所有人，也包括復刊後不再是編委的創刊成員，但不包括素葉叢書的所有作者，因為叢書的出版對象本來就不限於同人。按每期目錄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為刊登其上的旅行文本在內容思想及文學技巧上都有一定水平之外，更因為素葉同人在表述對中國文化歷史的認同之餘又始終立足香港，本土認同與民族認同之間的張力值得仔細研究。《素葉》由許迪鏘、何福仁、西西等多人於 1980 年 6 月創辦，出版了 25 期後，1984 至 1991 年間曾經休刊，直至 2000 年 12 月出版第 68 期後停辦。旅行文本集中在《素葉》休刊前的八十年代，在部份期數旅行題材佔該期一半以上，而且記述到中國旅行的遊記在所有遊記中佔超過一半，十分矚目，所遊地點囊括北京、蘇浙、西安、新疆、內蒙等大江南北。其中《素葉》同人曾同遊新疆及瀋陽，帶回詩、散文及小說，於《素葉》陸續發表，每有佳作。八十年代初的旅遊狀況和相關的文化生產情形仍然缺乏整理，[25] 回到刊物現場了解這段時間的文壇面貌是重要的第一步。本文透過整理《素葉》的中國遊記、遊詩與以港人到中國旅遊、新移民或中港關係為題材的小說，借用文化身份理論及旅行理論，企圖解答以下問題：香港如何想像和理解中國，香港文學所呈現的中國圖象在華文文學同類題材的文本中有何特色；旅行所引發的身份認同的反思和流變；旅行文本如何反映本土和旅行的關係。綜觀《素葉》刊登的所有旅行文本，可概括出幾個常見主題：例如中港兩地的經濟差異、與香港不同的文明秩序、老百姓的日常生活情景、秀麗的風景等等。本文擬集中討論與香港文學相關的三個面向：（一）遊記中的香港身份思考；（二）中國文化記憶和歷史想像；（三）旅遊與本土主體的誕生。

---

列出的編輯名單，休刊前的編輯包括（括號內數字為出任編務的次數）：許迪鏘（16）、何福仁（14）、簡慕嫻（即辛其氏）（14）、張愛倫（即西西）（11）、張紀堂（11）、周國偉（10）、陳進權（5）、張灼祥（4）、梁國頤（4）、鍾玲玲（3）、梁滇英（2）、韋愛賢（2）、淮遠（1）、何國道（即杜杜）（1）、阮妙兆（1）、朱彥容（1）。復刊後的編輯包括：許迪鏘（41）、何福仁（28）、辛其氏（18）、余非（15）、甘玉貞（13）、鍾玲玲（9）、朱楚真（8）、余漢江（7）。

25 接近本文所論時間的中國遊記選集可參考以下兩本：（一）唐羚編：《神州心影：中國旅行記》（香港：漢風文藝研究會，1983 年）。（二）選自《中國旅遊》畫報「旅情畫筆」專欄的遊記，書前有也斯的序：〈遊記的視野與性情〉，《中國旅情》（香港：明天出版社，1988 年）。

臺大學術期刊資料庫

## 二、中國遊記裏的香港性

正如劉細良《帶着偏見去旅行》[26] 的書名所說，旅人總是帶着偏見上路，胡晴舫也說「旅行不是關於認識世界；而是，關於認識自己。透過偏見。」[27] 旅行理論傾向否定旅人能夠真正理解旅行之地，反而在遊記中往往顯露作者如何透過「香港」的眼睛想像並理解中國，因此旅行文學在八十年代初承擔了香港人對本土身份與「他者」關係的思考，從中不難看到旅人如何自願或不自願地背負着香港這城籍。余君偉在討論也斯的旅行詩文時談到文化身份如何作為旅人行囊以至包袱：

> 如果某種文化身份意味着語言、生活習慣、思想態度、以至品味等特徵，一個香港人遊於海外，也總會將某種「中國性」或者「香港性」帶着上路，且不論這兩個所謂「想像社群」之中及之間存在着多少差異。如果行囊指的是某種身份，那可以是一種負累、局限、揮之不去的煩憂，甚至是恥辱，譬如一種被歧視的腔調、一種刻板印象或者不能適應異地的行為和思路，所以有時我們稱之為文化或者歷史的「包袱」。[28]

所謂「帶着香港性」上路，不一定是正面的（例如在異地想起香港），而可以是反面排除式的。最直接的表現是渴望看到不受香港影響的、「真正的」中國。旅行本身就是一種經濟不對等的行為，港人有能力到中國休閒旅遊，而大陸人來港主要是探親。[29] 中港的差異首先是經濟上的，七十年代起香港大量投資到廣東省，其廉價勞動力造就香港的經濟成就，大陸人為港資公司打工，對香港

---

26 劉細良：《帶著偏見去旅行》（香港：上書局，2007 年）。

27 胡晴舫：〈偏見〉，《旅人》（臺北：八旗文化出版社，2009 年），頁 69-71。

28 余君偉：〈家、遊、行囊：讀也斯的游離詩文〉，《香港文學 @ 文化研究》，頁 160。

29 以香港和廣東省的互訪人數為例，1978 到 87 年間有三千萬港人到訪廣東省，但到香港的中國居民只有 17 萬人。《香港簡史》，頁 216。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的商品和流行文化趨之若鶩，在社會論述中這種巨大的經濟成就差距是構成港人身份認同的關鍵，[30] 然而在文學中卻看到這種認同的反面表現，他們為之感到羞恥，和香港經濟同時發展的流行文化也在被排拒的旅行經驗之列。

比如康夫〈夜遊江門〉（1980）提到旅行社安排晚飯席間播放港式流行曲的突兀，[31] 又如何福仁〈新疆之旅〉（1981）寫到在天池邊也聽到幾個當地新潮青年以手提錄音機播放的鄧麗君破壞氣氛。[32] 追求看見當地原始面貌可說是旅客的人之常情，但在另一些例子中，則是對香港更激烈的否定。舉例來說，香港作家的中國遊記不時表示渴望見到或特別讚美中國的純樸民風。從異國情調理論來看，他們這「中國印象」背後是針對香港某些令他們不滿的特質，而被他們認定為中國人民「真正的」生活情景，是那些香港沒有或和香港相反的情景。例如廖文傑的〈人物五題〉（1982）記述作者到江南旅遊，認為：

> 沿途見到的中國同胞都是老老實實，沒有心計，熱心樸素，不貪圖甚麼不要求甚麼的簡單善良中國同胞，這次遇到的一位上海人，既精明能幹又工心計，只是這些精明與工心計都不外放在個人利益上，着實令人氣餒。[33]

事實上「善於營利」在別的語境下不見得是缺點，作者認定中國人民應該是純樸、不善經營、貧窮而樂天知命的，作者這一廂情願而武斷的觀點背後是對香港的否定，其旅遊感想總結起來是：「越接近香港的城市，便越容易習染不良風氣」，遊記通篇在否定香港，認為純樸的中國人才是國家未來的希望。張銳釗〈關於「遊記」〉（1982）也有類似觀點，他不認同大陸人湧到香港這拜金的城市謀生，認為是放棄了他們安土重遷的優點。[34] 他對純樸中國的想望構成

---

30 劉兆佳：〈「香港人」或「中國人」：香港華人的身分認同 1985-1995〉，《二十一世紀》第 41 期（1997 年 6 月），頁 43-58。

31 康夫：〈夜遊江門〉，《素葉文學》第 1 期（1980 年 6 月），頁 19。

32 何福仁：〈新疆之旅〉，《素葉文學》第 3 期（1981 年 11 月），頁 14-16。

33 廖文傑：〈人物五題〉，《素葉文學》第 13 期（1982 年 10 月），頁 26。

34 張銳釗：〈關於「遊記」〉，《素葉文學》第 12 期（1982 年 8 月），頁 26。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他幾篇描寫旅行中國的小說的重點。[35] 廖和張對純樸中國的追求暗含與香港的比較、對香港的否定。

卡勒（Jonathan Culler）指出，追求「本真」（authenticity）、渴望看見當地的真正面貌、當地人真正的工作和生活狀態，是旅遊觀光的關鍵結構。[36]「本真」理論旨在剖析普遍性的觀光心理，但在香港人的返鄉旅行中，這個機制牽扯到複雜的認同問題。例如阮妙兆〈導遊〉（1981）寫及作者渴求窺視當地人的真實生活，「到外地旅行，遊山玩水固然是我喜歡的，但我更希望知道在那陌生地方，人們生活的情形，每當走過人家的居所，我都不忘細看」，[37] 這行為卻飽含當地人／旅客、熟悉／陌生、故鄉／觀光景點之間的悖論，「我突然覺得，跟一個導遊，到自己的故鄉旅遊，本身便是一件滑稽的事。」籍貫、村名、鄉音作為符徵無法順利指向「故鄉」這符旨，作者深感兩者之間的錯位和自己的格格不入，帶出身份認同的問題。後文又提到她在旅遊車上聽到廣播裏播放香港電器的廣告：

> 大概是說甚麼牌子的電器用品最好，說回鄉探親，最好是帶這個牌子的出品，說上次帶了計數機大受歡迎，今次便預備帶電視機、錄音機回去。這是個我聽過許多遍的廣告，每次聽來都沒有甚麼特別感覺，但今次，在此時此地聽來，卻有點不自在，我偷偷的看我們的導遊和司機一眼，看他們可有不悅之色，但他們都像全不介意，安然的坐在那裏。[38]

在香港常常聽到的廣告卻因她處身異地而突然變得刺耳，她為香港與大陸的經濟差異而感到不自在，彷彿提醒她無論她多麼想成為當地人，她始終不是，因為七、八十年代以來社會上已形成牢固的「香港人」與「中國人」的身份分類。[39]

---

35 見後文的討論，註 66。

36 Jonathan Culler, "The Semiotics of Tourism," *Framing the Sign: Criticism and Its Institutions*, (Norman: University of Oklahoma Press), 1988, p. 159.

37 阮妙兆：〈導遊〉，《素葉文學》第 4 期（1981 年 12 月），頁 11。

38 同前註，頁 11-12。

39 馬傑偉、曾仲堅：《影視香港》（香港：香港中文大學亞太研究所，2010 年），頁 34。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香港的身份作為無法卸下的行裝，有時在中國或異地旅行帶給他們方便（中國政府給港澳僑胞的優待政策），有時卻帶給他們尷尬和麻煩。例如李孝忠的小說〈長江行〉（1982）雖略嫌生澀，[40] 卻展示了香港人介乎外國人和中國人之間的尷尬身份，即使他們徹底認同中國文化，對國內情況也相當熟悉，當地人並不把他們看成中國人。小說講述兩名香港人運國、向晴到長江旅遊，特意設定他們為教師，以合理化他們對中國文化歷史的認知。故事主要場景是一艘遊江輪船，上船不久，運國舉起相機拍照，惹來幾個當地人上前搭話，欣羨地問他的相機多少錢。「『不便宜，我們可買不來。』男子不勝羨慕地說，『那差不多是我整年的收入了，你是香港來的嗎？香港人賺錢很容易吧！』」這時候船務員發現了他們，直斥本地人不能出入華僑及外賓專用的船艙，男子惱羞成怒：「華僑又怎樣？也是中國人，為甚麼要厚此薄彼？……華僑便很了不起嗎？不要以為華僑便可以有特權！」他被拖走後，當地人與華僑之間就立起了甚具象徵意味的鐵欄。向晴悶悶不樂：「我們回來旅行，也不想人家當我們特權階級的看待。」接着作者安排他們偶遇兩名修讀中國文學的法國大學生向他們請教中國文化，雖然前文寫及運國對國內情況之留心和熟悉，但此時運國的反應是因外國人的普通話說得比自己好而「自愧不如」、也不敢承認自己對中國文化有深入的認識。[41] 小說雖然描寫了開放旅遊之初、中國人與香港人之間的主要誤解，但同時也鋪陳了溝通理解之路。運國、向晴在船上結識了兩名廣州教師小王與小陸，小王問他們「香港教書很舒服吧！……人人都說香港賺錢容易」，待問清楚教務之繁重才為之咋舌。小王和搭問相機的男子一樣代表中國人對香港的誤解；另一香港遊客衛以信代表典型的觀光客，把誤解視為當然，又認為當地人為了賺觀光客的錢而產生許多問題；向晴和小陸則代表理性溝通和理解，知識和立場最接近隱指作者。其中「都是中國人」是關鍵句子，通篇出現了好幾次，小說最後他們一邊遊江一起合唱《我的祖國》，在一片歡

40 李孝忠：〈長江行〉，《素葉文學》第 6 期（1982 年 2 月），頁 25-30。
41 同前註，頁 27-28。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樂和諧的氣氛之中結束了故事，暗示即使中港雙方有那麼多的誤解仍然可能共融，大有「大家都是中國人」的意味。

許迪鏘有一短文〈都是中國人〉卻對此加以嘲諷，相比之下李或者顯得天真了。〈都是中國人〉記述他和朋友在臺灣和計程車司機爭執，因國語溝通的誤會，司機空等了他們一個下午，隔日跑來找他們算帳，事實上司機多收了一倍車費，爭執之下司機自覺理虧，使出「殺手鐧」：「我們都是中國人呀，你不要以為你們從香港來的就高人一等。」作者大為光火，這句話完全可以在不同語境下被自由挪用：

> 他為甚麼要這樣說呢，正因為我們都是中國人，他才不該這樣對她們說話。……既然大家都是中國人，她們為甚麼不獲諒解與寬容，而在事隔一夜之後，仍會受到苛責。[42]

他隨即聯想到當時正在進行的中英談判，中國領導為了安撫港人而不斷強調「我們都是中國人嘛」，經歷了這次爭執後他才發現這句話不足成為安慰：

> 最近我們都為香港的前途憂慮，領導人說：你們害怕甚麼。言下之意，大概也就是：我們都是中國人嘛。不錯，我們都是中國人，但那到底又是一個怎樣的保證？[43]

誠然，旅人在到處旅行時也不得不帶着對香港前途的揣想。西西〈礫石〉（1981）發想自素葉同人的新疆遊，詩人想像自己是戈壁灘上無數石塊的一分子，然而即使成為西域的石頭也依然帶着對香港城市生活的思考：

> 高興在甚麼方向定居
> 就在甚麼方向
> 定居
> 無需分期付款

42 許迪鏘：〈都是中國人〉，《南村集》（香港：素葉出版社，1995 年），頁 123-124。

43 同前註，頁 124。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還交甚麼差餉地稅）
在這裏
無需淘米煮飯
洗衣服
（還交甚麼水費呀）……
（運糧隊
在遠遠的北方
皇上御駕親征
攻打伊犁去了）
一九九七年
或是九九七一年與我
何干呢[44]

雖然詩人故意說成為石頭後香港的一切都與她無關了，其實這樣說只更證明她如何心心念念香港的去向問題，擺脫了香港的環境還擺脫不了對香港的情思。這些思考都因為人在異地而特別尖銳，也說明了「遊」的確是以「家」為前提，越界反而加強我們的「本土性」，更感受到本土身份認同的存在。

## 三、中國風景的歷史召喚

另一方面，中國遊記在說「香港故事」的同時也說出「香港的中國故事」。我們應該如何理解西西等香港作家與本土認同共存的「中國人」身份認同，以及《素葉》上不少旅行文本對「詩詞中國」與「歷史中國」的熱切追尋？香港文學的「中國性」表現與其他華文地區文本有否不同？本節將先整理《素葉》旅行文本的歷史尋訪，最後再回應以上的問題。

卡勒在 “The Semiotics of Tourism” 一文中指每個旅客都是符號學家，旅行

44 西西：〈礫石〉，《素葉文學》第 3 期（1981 年 11 月），頁 4。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就是不停尋找該地文化的象徵，並把每個所見之物詮釋為該文化的再現，把城市、風景及文化閱讀為符號系統。另一方面，我們「看見」一棟建築、一條街道或一片風景，必定是因為它們被「標記」為值得看見的，沒有被「標記」的將不會被注意到——「標記」（marker）即任何令風景成為風景的信息，路牌、旅遊單張、影像、描寫該地的文學文本及相關的文化記憶創造了旅遊景觀。[45] 在中國旅遊散文，最常見的「標記」是中國古典詩文及歷史掌故。例如何福仁的遊記清楚地展現了文本如何對風景起作用。他的遊記充滿閱讀書本而來的知識，常常讓人感到他在實際遊歷當地前，已經在書本上仔細地旅行過了。例如〈新疆之旅〉記述他和素葉友人一道到新疆旅行，所攜同的「文化地圖」是《西遊記》、《大唐西域記》、唐詩與唐史掌故，比如酒泉是李廣與同袍有酒同喝的酒泉，火焰山是《西遊記》的火焰山，交河郡是杜甫詩「戚戚去故里，悠悠赴交河」的交河等等。[46] 有時作家們對照着文化與歷史記憶遊歷神州時，除了看到眼前的景物，更多的是看見盛唐的詩文或某部史籍的片段，他們遊歷大江南北，尋覓心愛的傳統文學中提過的地方，所到之處常以實地所見對照印證他們對中國的文化想像和歷史記憶，正是這反覆印證的動作令這批八十年代的旅行文本具廣義的尋根意味。

文化標記的觀光機制因着中國旅遊的文化歷史性質而特別突出，中國遊記常展現中國風景的歷史召喚能力。不少遊記都感嘆於中國山河的壯麗，大山大河的「崇高感」（sublime）時見於文本之中，而「崇高感」又往往與歷史感聯結。[47] 例如在西西和何福仁的對話集《時間的話題》中，談到關於「畏懼」

---

45 "The Semiotics of Tourism," *Framing The Sign: Criticism and Its Institutions*, pp.161-163.

46 何福仁：〈新疆之旅〉，同註 32，頁 14-16。

47 鄭振偉論黃國彬的中國遊記時曾指黃行文每多出入歷史典故，歷史的縱深感和氣魄是令其散文具「崇高感」的修辭手法之一。鄭振偉：〈黃國彬旅遊散文的崇高感——《華山夏水》和《三峽、蜀道、峨嵋》〉，《中文文學拾論》（香港：天地圖書出版社，2000 年），頁 45-46。

香港學術期刊資料庫

的種種，他們提到 1986 年素葉同人一起到黃山旅行，當他們坐在蓮花峰上時感受到的敬畏感。[48] 俞風在〈初識的河〉（1984）記述他 1979 年第一次到肇慶旅行路過西江，第一次見識甚麼叫河時的喜悅；[49] 其詩〈車過河南河北〉（1980）記錄了初識黃河引起的心潮洶湧和歷史想像。[50] 往後「河」的意象反覆出現在他的筆下，而且常常與歷史相關。[51] 不難想像，久住都市的香港人初到中國旅行、見識名山大川時所產生的震懾。這樣的中國風景被蓋滿卡勒所說的歷史文化的「標記」，普通風景也能牽引出「千百年來如此」的洪荒時間感，似乎旅行中國特別能感覺到悠遠的時間長河，而歷史又和許多詩文相關。俞風的中國遊記收錄於其散文集《牆上的陽光》，部份曾刊登於《素葉》。在他筆下，眼前風景總是和歷史連結起來；或者說，他只看到有歷史文化作為「標記」的風景。當他遊罷曲阜的周公廟出來，看見門外一久睡初醒的老者，不禁聯想到周公廟見證過的悠悠歷史，「老翁站起來，背對古廟，向蒼蒼田野，喃喃自語。千古興亡事，一覺而已。」[52] 西西的〈交河〉（1981）記述她和素葉同人到新疆旅遊，探尋交河古城遺址。交河附近是沙地，也沒有石頭建築物，地上卻忽然發現一塊小石，歷史幻想遂汩汩而來：

> 來自戈壁灘，還是，石頭原來遠古器皿遺留下來的一件殘片？麴氏王朝的交河郡，是昌盛的繁華地，不乏施紅彩黃的蓮花紋陶瓷、明艷富麗的刺繡織錦，一塊石頭，屬於城裏哪一個角落、甚麼寂寂無名的事物？一千多年前，車師前部首都的交河，難道又會是磨製石器與彩陶文化的

48 西西、何福仁：〈害怕與畏懼：尋找卓古拉〉，《時間的話題：對話集》（臺北：洪範出版社，1995 年），頁 57。

49 俞風：〈初識的河〉（1984），《牆上的陽光》（香港：素葉出版社，1994 年），頁 119-120。

50 俞風：〈車過河南河北〉（1980），《看河集》（香港：素葉出版社，1994 年），頁 42-49。

51 除了河，俞風也酷愛登山，是其遊記的常見主題。他不但常常在香港郊野遠足，到中國旅行也經常挑戰攀登名山，見《牆上的陽光》。

52 俞風：〈曲阜五題〉（1985），《牆上的陽光》，頁 138。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共存期，人們以石刀、石鋤、石鐮、石鏃作為主要農耕漁牧的工具？**[53]

一位沉睡的尋常老人和一塊平凡的小石也能引起無限歷史遐思，恐怕是中國旅遊獨有的歷史感。

倘若與其他作家的中國遊記相比，素葉同人的獨特之處在於他們在歷史文化面前的低姿態。鍾怡雯形容中國風景一向是民族主義的象徵，稱為「意識型態召喚」，[54] 香港的中國遊文本既印證了這點又反轉了這點：他們感受到中國風景所召喚的文化歷史，卻對民族立場心存反思。[55] 比如在臺灣的中國旅行散文裏，中國風景（甚至只是想像中的中國風景）往往召喚出文化認同的意識型態，語調似乎遠為浪漫激越。[56] 又例如中國歷史遊記中最有名的余秋雨《文化苦旅》，[57] 其中知識份子作為歷史代言人的高姿態在素葉同人筆下就很難看

---

53 西西：〈交河〉，載西西著，劉以鬯編：《交河》（香港：香港文學研究社，1981年），頁 1。

54 鍾怡雯：〈故土與古土：論台灣返鄉散文〉，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文學系編：《解嚴以來台灣文學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臺北：萬卷樓圖書公司，2000 年），頁 486-513。

55 語調最激昂熱切的要數張銳釗，先後有散文〈根〉（1982）及小說〈夜行列車〉（1983）、〈塞上曲〉（1983）刊登於《素葉》。即使他的小說用了第三人稱敘述、企圖與作者本身拉開距離，仍然無法掩飾他的狂熱。張銳釗：〈根〉，《素葉文學》第 11 期（1982 年 7 月），頁 20-21。張銳釗：〈夜行列車〉，《素葉文學》第 19 期（1983 年 8 月），頁 6-11。張銳釗：〈塞上曲〉，《素葉文學》第 20、21 期（1983 年 11 月），頁 28-30。事實上，不少素葉同人與張銳釗一樣認同中國人的身份，分別卻在於他們的文學表現。楚真：〈江南山水〉，《素葉文學》第 8 期（1982 年 4 月），頁 26-28。許迪鏘：〈長城〉，《素葉文學》第 9、10 期（1982 年 6 月），頁 9。

56 鍾怡雯：〈故土與古土：論台灣返鄉散文〉，同註 54，頁 486-513。臺灣外省第二代作家對中國的書寫和鄉愁，民族認同與臺灣本土認同之間的消長變化，以及他們和第一代外省人有機會到中國旅行時的文學表現，請參考《雙鄉之間：台灣外省小說家的離散與敘事（一九五〇－一九八七）》，第五、第六章。

57 余秋雨自信通過旅遊能重建當地的歷史現場，有責任把他在當地感知的文化內涵和歷史通過文章傳達出來。他的影響很大，曾掀起「文化散文」的熱潮，也引來不少學者反思「歷史現場是否可以重建」的問題。參考許建崑：〈文化現場的再造與迷思——論余秋雨散文二書所表現的文人情懷〉，載東海大學中文系編：《旅遊文學論文集》（臺北：文津出版社，2000 年），頁 206-231。

國家圖書館學術期刊資料庫

到。這種殊異的表現可能不是出於對中國文化、歷史或民族認同的程度差異，而更多是出於美學傾向的不同。八十年代香港純文學書籍裏最暢銷的中國遊記作者黃國彬，加上當時在港的余光中，他們的新古典主義帶起了一股描寫祖國山河、抒發民族情感但沒有現實基礎的模仿風氣，堆砌濃郁的情感和風景成為某種易於生產作品的公式。[58] 黃醉心經營的「偉大、崇高、聖潔、飛升、回歸原鄉」的古典主義美學風格，[59] 與素葉同人樸實的行文迥然不同，而美學風格的差異決定了他們作品的姿態高低——黃的古典傾向使他嚮往中國的偉大文化傳統而輕視香港，素葉同人則始終立足本土，[60] 因而他們的遊記上看不到與狂熱的民族主義或單向的尋根，反而時有反思，甚至刻意與國族論述拉開距離。

例如俞風的旅行雖以尋訪歷史為目的，卻不只一次表示對於當地他終究是無法理解的、自己並不懂得中國為文章的結語，代表的是謙虛的知識分子的旅遊態度。例如遊曲阜，從前文來看他對儒家典籍和孔子事蹟相當熟悉，文末卻表示「聖人久已矣，我忽然有一種巨大的陌生感，在曲阜走了兩天，終於明白對於孔子，對於儒家，我竟然是完全沒有認識的。」[61] 遊臺南金城，開篇說希望在旅遊中「看看在另一個政府治理下的中國人，有怎樣的面貌，且印證從小說詩文、政論文章所得的粗淺印象。」記遊時也穿插臺灣從清朝到先後被荷蘭及日本殖民的歷史，可見他對當地的認識不淺，然而遊罷仍說：「正如我不能理解熱蘭遮城牆的沉思一樣，我也不明白億載金城。正如我不明白億載金城，我也不明白臺灣。」[62] 這樣的轉折有時因為前文缺乏鋪墊而顯得頗為突兀，但

58 對此風氣的批評，見《羅盤》「陳德錦專輯」諸文，尤其這篇：貝類：〈祇是幾句說話〉，《羅盤》第 8 期（1978 年 12 月），頁 46-47。

59 參考王良和：〈從偉大、聖潔、飛升到回歸原鄉——論黃國彬的創作意識〉，《余光中、黃國彬論》，頁 181-221。鄭振偉：〈黃國彬旅遊散文的崇高感——《華山夏水》和《三峽、蜀道、峨嵋》〉，《中文文學拾論》，頁 32-52。

60 關於二者美學傾向的差異，可參考《羅盤》詩刊的自我表述——《羅盤》是素葉同人在《素葉》之前創辦的刊物。對兩派美學差異的概括，參考王良和：〈青年文學獎與「余派」之說〉，《余光中・黃國彬論》，頁 64-71。

61 俞風：〈曲阜五題〉（1985），《牆上的陽光》，頁 143。

62 俞風：〈走路往金城〉（1984），《牆上的陽光》，頁 113-117。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可以說在素葉作家的中國遊記中，很難找到自詡中國歷史文化代言人的姿態。

在《素葉》其他作者筆下雖然也能找到對祖國直接抒情的例子，但大部份文本沒有噴薄而出的民族激情，很多時候是語調平和的旅行記錄和思考，令人想起也斯認為香港文學的特色正在於對民族激情和浪漫情緒的保留態度。[63] 以淮遠為例，他的詩〈綿羊與 K〉（1984），由旅行入住酒店的糾紛帶入港人的護照問題，透過巧合的情節安排，突出英國國民海外護照（B.N.O.）與港人身份之間的落差（「牠說：我要接的／是一位東方人／瞧／河本先生護照的紅色封面／就有兩行／東方文字／你的藍色封面/全是英文」），清楚地突顯了個體在異地旅行時是怎樣無可避免地帶着城籍的烙印，而這身份又怎樣成為旅人的「包袱」。但這首詩重要之處在於其結尾如何以淮遠式的黑色幽默化解身份問題的沉重：綿羊最後接走了日本人，詩人才忽然想起：

我昨天晚上
吃過一塊
四十一法郎
半生不熟
膻膻的煎羊排
而且昨天晚上
和今天早上
都沒有
刷過牙
這該死的綿羊
把我們甩下
也許並非
真的因為

63 可參考也斯：〈從緬懷的聲音裏逐漸響現了現代的聲音——試談馬朗早期詩作〉，《素葉文學》第 5 期（1982 年 1 月），頁 26-30。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我該死的護照
或者別的什麼[64]

又比如他另一篇遊記〈尋找江青〉（1997）雖然題目如此戲劇化，首句卻馬上撇清:「這幾個月才開始搜集文革陶瓷，跟歸併一事無關，『純屬巧合』。」[65]此外，許迪鏘的散文也不時有令人莞爾的自我解嘲，[66]〈我不（一定）是龍的傳人〉質疑當時流行自稱「龍的傳人」的可信性，從文獻考據的角度論證龍的形象本是不祥的，他在階級上（帝皇象徵）和民族根源上（黃帝、炎帝的族徽分別是龜和羊）也無法稱為「龍的傳人」，「『龍的傳人』這種說法，不多不少反映大中原心態，是一種虛浮——如果不是虛假的話——的民族情感話語。」[67]

香港遊記的特色，在與其他華文地區書寫中國的散文比較時最為明顯。臺灣和馬華文學都是重要的對照，此處因篇幅與筆力所限僅能勾勒幾個特徵以突出本文的論點。林幸謙、鍾怡雯、陳大為等馬華作家的作品曾在最後幾期《素葉》出現，雖然數量不多，但因其濃重的離散感傷、集中的內容（南洋華人辛酸史）以及情調上與香港移民潮的和應而不可忽視，[68]香港人面對移民離散的感傷奇妙地獲得馬華作家的文化鄉愁呼應。香港文學和馬華文學有不少相似之處，例如兩地都曾被英國殖民、第一代南來者對中國的鄉愁、本土成長一代的身份認同議題等等，但馬華作家的作品籠罩在香港七十年代以後已經非常少見

64 淮遠：〈綿羊與 K〉，《素葉文學》第 24、25 期（1984 年 8 月），頁 13。
65 淮遠：〈尋找江青〉，《素葉文學》第 63 期（1997 年 10 月），頁 65。
66 例如〈意外〉、〈焦山風雨〉都是好例子。許迪鏘：《南村集》，頁 125-126，159-162。
67 許迪鏘：〈我不（一定）是龍的傳人〉，《老師沒有告訴我，我也無從告訴學生的歷史及文學片斷及思考》（香港：進一步多媒體有限公司，2007 年），頁 65-69。
68 比如鍾怡雯在其博士論文中把《素葉文學》與《蕉風》等並列為取樣範圍，足見這批文本受到注意。鍾怡雯：《亞洲華文散文的中國圖像（1949-1999）》（臺北：萬卷樓圖書公司，2001 年），頁 4。她的論文闢有一節專論香港文學中的離散，但集中討論五十年代南來文人的鄉愁，以聯結其他華文地區作品形成更宏觀的「中國圖像」，未有注意到八十年代初的旅行文本也有大量的「中國圖像」。退一步而言，也說明素葉有一定的開放性；而素葉的國際性格，也是香港文學性格的自然反映。

臺灣人文學術期刊資料庫

的鄉愁之中。鍾怡雯指馬來西亞獨立後出生的華文作家的中國慾望主要體現為古典詩詞的大量挪用，她稱之為「古裝策略」，[69] 在他們的散文中，中國圖像浸潤在古典詩詞之中；《素葉》的中國遊記雖然也不乏文化和歷史標記，卻沒有其中感傷浪漫的文化鄉愁。至於臺灣外省第一代作家返鄉的複雜「異鄉感」、第二代作家的孤兒意識、對「父／鄉」的渴望等等都是香港遊記所沒有的。[70] 在臺灣的返鄉散文中，時常可以看到「文化中國」與「政治中國」的分裂帶來的痛苦。可能因為香港因為不如臺灣與中國絕對分隔，因此重新接觸時也不如臺灣散文表現得震撼激動。六、七十年代成長的香港作家告別了五十年代南來作家的鄉愁，也與臺灣及馬華的懷鄉散文對中國風景傾注的強烈思念和熱情截然不同。從《素葉》的旅行文本來看，香港作家到中國旅行時並沒有臺灣或馬華作家對中國的糾結情感，或者是因為沒有繼承民族文化的包袱，他們除了是「返鄉」、返回文化根源地，更多是以觀光客的身份瀏覽風景，又或是以觀光的方式返鄉。然而這「觀光客」的身份不無諷刺，對於認同中國的香港作家來說，他們的中國人身份在觀光旅遊中被徹底疑問化，即使他們對中國的文化和歷史再熟悉，當地人只是把他們當作與自己不同的外來觀光客而已，「觀光旅遊」這舉動裏的經濟等級差異以及陌生／熟悉、外來／原居等的對立，令「香港人到中國觀光」本身就飽含了歷史反諷，這種歷史造成的反諷的「旅行者」身份反而成就他們獨有的平靜的文字風格。

---

69 對馬華作家來說，古典文學代表最精純的華語，與他們日常使用逐漸馬來化的語言不同。這是因為很長時間裏華文在馬來西亞地位低落，語言對馬華作家來說是重要的文化血統，香港雖也經歷過爭取中文成為官方語言的合法化運動，但香港文學一直以中文為主。《亞洲華文散文的中國圖像（1949-1999）》，頁 113-120。雖然她所論的是懷鄉散文（作家並沒有踏足中國），與本文所論的旅行文學不同，然而也有不少可供對照的見解。

70 侯如綺：《雙鄉之間：台灣外省小說家的離散與敘事（1950-1987）》。對臺灣返鄉散文的討論參考楊佳嫻：〈離／返鄉旅行：以李渝、朱天文、朱天心和駱以軍描寫臺北的小說為例〉，《中外文學》第 34 卷第 2 期（2005 年 7 月），頁 133-155。鍾怡雯：〈故土與古土：論台灣返鄉散文〉，同註 54，頁 486-513。

臺灣人文學術期刊資料庫

## 四、旅遊與本土主體的誕生

分別討論過《素葉》遊記的香港性及中國性後，最後擬探討旅遊和本土更深層的關係，就是觀看主體的誕生。以「遊」為終生創作母題的香港作家也斯有一說法提示了旅行對本土文學的推動。他認為遊記雖是古老的文體，卻可以翻出新意，觀察就是首要的一步，而這種在旅行中養成的敏銳目光將有助於書寫香港。從他描述自己的散文寫作經歷，可以發現本來有觀光獵奇性質的旅遊，到了他手裏一變而為日常化文學風格的鍛鍊：

> 最先喜歡寫地方，是因為喜歡旅行。但不管是世界著名的大都市，或是自己居住的那條又破又舊的街道，令我們寫當然是有些甚麼觸動了我們，使我們想把它表達出來。大家看新事物會敏感，肯化時間去看，這種觀看新事物的敏感和耐性，如果也能用於日常的事物，那就不會急於獵奇，對尋常的人事也能細看，越過浮泛的泡沫，看到事情的底裏吧。[71]

他呼籲大家以觀察外地的熱情來觀察本地，連繫到七十年代香港新詩的生活化風格，就能明白他的說法符合香港文學發展事實。[72] 舉例來說，西西《我城》的「零度經驗」寫法是「以首次看見一件事物的態度去觀察它的外貌和理解它

---

71 也斯：〈公眾空間中的個人論說〉，《香港文化空間與文學》（香港：青文書屋，1996 年），頁 70。另一篇文他也說到旅行如何培養新的觀看角度：「一個自然美景也是塑造個人胸襟的養分，是孤寂失望失去信心時回想起來的安慰。從與外界山川相遇開始，人的心靈在感受之餘，往往回頭去反省調整自我，再又帶著新的眼光去看新的事物，物我之間的交感來回不息，往返不絕。」〈遊記的視野與性情〉，《香港文化空間與文學》，頁 81。

72 黃國彬有一與也斯似同實異的說法：「香港的生活圈子小，作家得不到祖國大地、河山的薰陶，所見所聞不廣，所觸所感不深，創作時也有很大的局限。」他對旅遊的推崇是以否定本土為前提的，與俞風由旅遊觀察省思而正視本土的態度恰成對比。黃國彬：〈六年辛苦不尋常〉，《第六屆青年文學獎文集》（香港：香港大學學生會，香港中文大學學生會，1979 年），頁 145。

國家圖書館學術期刊資料庫

的特性」，[73] 其實與旅人對首次到訪異地的好奇目光一樣，而《我城》陌生化語言的成就有目共睹。在敏銳的作家身上，旅人對異地的好奇和求索在回來香港後並不會中止，如此竟把厄里和胡錦媛等旅行理論中「家」與「遊」的次第反轉了。旅行產生敏於觀察的旅行主體，風景因而成為客體，旅人自風景中抽離自我才有「觀察」的產生。「遊」的含義，除了「行走其中」，還必須加上抽離的、敏於觀察和反思的主體，這種主客分離的過程和本土意識的建立過程結構相同。羅貴祥分析香港七十年代新詩時指本土意識不是指對本土的無條件認同，而是一種物我分離的意識，「香港」成為被審視反思的客體對象。[74] 因此在具強烈本土意識的文本中，敘事者和香港的關係竟有如旅人和旅行之地的關係，分別在於常居比旅遊有更多的時間反覆了解一地，但其中「遊」的性質是一致的，以班雅明「漫遊者」理論研究城市文學的熱潮可以證明旅行觀光與本土觀察之間的同構性。循此方向，旅行文本和本土文本的關係就有更多可以互相闡發之處，旅行如何產生旅人對自身的理解，這裏以俞風和西西為例。

在俞風的散文集《牆上的陽光》裏，第三輯的中國遊記比第一、二輯描寫本地的散文更早寫成。第一輯的散文有不少描寫本地遠足郊遊，第二輯〈西營盤〉（1983）、〈登獅子山記〉（1984）、〈水坑口街〉（1986）等幾篇則記他遊走各區尋訪香港殖民歷史，其中的文章有不少曾刊於《素葉》。它們皆有「遊」的成分，「遊」是觀察的前提和書寫的動力，也令他自覺到「觀看」這動作及其限制。〈望夫石記〉（1985）記沙田望夫石的傳說，證成了上述關於抽離觀察的論點。在山下看頭身分明的石頭，攀到石上回看卻形象模糊：

> 因為距離過近，我們無能為力。不，也許應該說，因為我們就是石頭的一部份，所以無法認識自己，無法了解自己的姿態、自己的眺望、自己

[73] 董啟章提出以「零度經驗」取代過往用「天真語調」和「孩童觀點」形容《我城》。董啟章：〈城市的現實經驗與文本經驗：閱讀《酒徒》、《我城》和《剪紙》〉，《香港文學 @ 文化研究》，頁 400。

[74] 羅貴祥：〈經驗與概念的矛盾——七十年代香港詩的生活化與本土性問題〉，《香港文學 @ 文化研究》，頁 241-252。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 的風化，甚至無法明白自己為何長年累月站在山巔，無法憶起自己走過的路、過去的歲月。[75]

這樣的觀點呼應了他的廬山遊記〈共看廬山雪〉（1984），身在山中不識廬山真面目，「所以，你看，廬山就只能寫成這個樣子了，雪也只能寫成這個樣子，寫得不好，是因為身在雪山中。」[76] 俞風的中國遊記和以本地為題材的散文有幾個重要的共通點：抽離的視點、哲思和對歷史將信將疑的態度，尤其是俞風喜愛歷史旅遊，尋訪歷史的舉動從中國旅行一直延伸到本地，〈西營盤〉及〈水坑口街〉即為例子，對歷史的態度一以貫之，證實旅行與本土有互補共通之處。

另一方面，旅行中國給他的靈感並不終止於旅行，而是繼續延伸，在往後的日子裏以回憶、意象或修辭的方式反覆出現，融合他對香港的描寫，旅行所提供的書寫潛能可見一斑。他自中國旅行所得到的印象不時疊印在香港的景觀上，對讀〈初識的河〉（1984）和〈車如流水〉（1984）兩篇，就能看到他在中國江河得到的感受移用到香港城市景觀：

> 幾天後和朋友在肇慶市蹓躂，無意中走上河堤，看黃昏裏靜靜流過的江水，自西而東。……我沿石階拾級下堤邊獨坐，第一次如此親近河水，我便想起「逝者如斯不舍晝夜」這古老的喟嘆。（〈初識的河〉）[77]
>
> 那一段日子剛畢業，下班後常獨自散步回家。有幾回在疲倦的交通燈前停下，看汽車匆匆流過，猛然驚覺彷彿就站在川上，興起逝者如斯之嘆。……從起點到終點，在乎的應該是流動的過程。流動，始成河。在交通燈前我這樣想，且怦然憶起多年前在西江堤下看河，那些暗自翻動的思緒了。（〈車如流水〉）[78]

〈車如流水〉通篇充滿「河」的轉喻，車流、歲月、社會際遇、人生的意義等

75 俞風：〈望夫石記〉，《牆上的陽光》，頁 79。
76 俞風：〈共看廬山雪〉，《牆上的陽光》，頁 131。
77 俞風：〈初識的河〉，《牆上的陽光》，頁 120。
78 俞風：〈車如流水〉，《牆上的陽光》，頁 43。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都以河為喻，帶出他的哲思，而且呼應較早寫成的〈初識的河〉裏自比為一條河的形象。[79]

旅行文學對香港文學的助力，不只是提供香港文學沒有的「河山」為意象修辭。異域書寫大大豐富了香港文學的內涵，早在崑南〈攜風的姑娘〉（1963）中人物種族模糊、故事場景異域化等表現的抽象國族認同問題已被論者注意，[80] 似乎香港文學的其中一個特長，是代入「非我族類」的角色（這和長久以來大中原心態認為香港是「非我族類」的「南蠻」真是恰成有趣的對比。）《素葉》也有不少例子，如辛其氏〈飛〉（1981 年第 2 期）、〈真相〉（1982 年第 7 期）、靈石〈一夜橋〉（1991 年第 27 期）、適然〈我所仰望的天空〉（1993 年第 41 期）、許榮輝〈停電〉（1993 年第 43 期）等多篇。西西是此中的佼佼者。

西西的例子更清楚的說明了在旅行中誕生的觀看主體如何反饋到她書寫香港的文本上，同時展現了旅行和自省、理解外地與理解自身的平行過程。西西的中國旅行文本可按其視點分成兩組：在第一組文本裏，敘述聲音是一個到中國旅行的人；在第二組文本裏，敘述聲音都設定為中國老百姓。第一組代表旅人的視點，包括收在《石磬》（1982）裏的由〈河〉到〈礫石〉共十二首詩，[81] 散文小說集《交河》裏的〈交河〉（1982）、〈羊吃草〉（1981）兩篇遊記，以及收在《春望》的小說〈奧林匹斯〉（1979）。第二組代表當地人的視點，

79 「河的意義就在河身上」的道理，在另一篇記登山的散文〈尋找石碑〉中則體現為旅行的意義。「旅行的目的究竟在於目的地的一件古蹟、一幢古建築、一座名山，抑或是走向那件古蹟、那幢古建築、那座名山的過程呢？至於到達目的地後，是否找到這些名勝古蹟，又是否重要的呢？」俞風：〈尋找石碑〉，《牆上的陽光》，頁 81-82。

80 陳智德：〈放逐的省思：六十年代的香港新詩〉，《呼吸詩刊》第 6 期（1999 年 2 月），頁 74-82。

81 這十二首詩當中，敘述聲音主要是遊客；例外的是〈河〉和〈玉蜀黍〉，敘述聲音不明，另〈奏摺〉和〈雨與紫禁城〉則代入歷史人物，後文將再談到。其中〈玉蜀黍〉和〈塞外〉都是西西自創的「河流體」，對照〈奧林匹斯〉把中國稱為「大河的兩岸」，可見西西甚為喜歡這個河的意象。西西：《西西詩集》（臺北：洪範出版社，2000 年），頁 76-125。

臺灣人文學術期刊資料庫

都是小說，包括收在《交河》的〈阿莎〉（1981）和〈戈壁灘〉（1981）以及《春望》的〈北水〉（1979）、〈龍骨〉（1980）共四篇。嚴格來說，小說組不能算是旅行文學，但兩組文本對照下可以發現文類和視點設定的密切關係和觀看的結構。這類小說最早的一篇是〈奧林匹斯〉，[82] 奧林匹斯只看到華麗的大場景、文化歷史古蹟，亦即被「標記」的風景名勝，慶卻更喜歡觀察沒有被「標記」的當地人的生活。慶和奧林匹斯的雙重視點結構代表兩種旅遊態度，同時也預告了西西的旅行文本模式。

這兩種視點在其後幾篇小說中以新的比例呈現，在〈阿莎〉、〈北水〉、〈龍骨〉、〈戈壁灘〉這四篇採用老百姓為「內聚焦」視角敘事的小說中都出現了路過的觀光客，也就是說透過小說，西西翻轉了觀看與被觀看的位置，像〈北水〉那樣以當地人的眼光反思旅行觀光。通過虛構手段，她「成為」當地人，反身（reflexive）觀看自己這些旅行者。例如何福仁〈新疆之旅〉記述他們對在荒漠火車站中工作的人的好奇，到了西西手裏就翻轉成〈戈壁灘〉裏阿帕加的感想，兩篇刊於同一期《素葉》，一讀便知：

> 跑了好一段路居然可見一二小屋，在無垠的沙漠裏苦撐，車跑過時，有人在門外拿着旗幟，原來是鐵路的維修工人。這種工作，要比守燈塔孤寂難堪得多。日當頭，要挨受熊熊的曝灼；而晚上，則是苦寒。過路的火車是唯一的慰藉。（〈新疆之旅〉）[83]
>
> 他們說：戈壁灘上的一個小火車站，比一個孤島上的燈塔還要寂寞。寂寞，甚麼叫寂寞呢，從來沒有人知道戈壁灘上熱鬧的樣子，你可以聽見陽光照在旱地上黏土龜裂的聲音，你可以聽見一塊石頭瓦解成細沙的聲音，……他們這樣說是因為他們不知道戈壁，……人們只看見這些，但我知道戈壁，我在這裏畢竟這麼多年了。（〈戈壁灘〉）[84]

---

82 西西：〈奧林匹斯〉，《像我這樣的一個女子》（臺北：洪範出版社，1984 年），頁 7-12。

83 何福仁：〈新疆之旅〉，同註 32，頁 15。

84 西西：〈戈壁灘〉，《素葉文學》第 3 期（1981 年 11 月），頁 3。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這種雙重視點到了〈龍骨〉更達到諷刺和反思，這篇小說改編自河南安陽市小屯村把殷墟甲骨當藥材吃的事，通過農民鄔有田的視角，點出文物保育先於民生解困的荒謬性，完全拋開知識分子的觀點，對當地人不是譴責而是體會。[85]

西西的雙重視點一方面帶出中國與香港、旅人與當地居民之差異距離，另一方面又展示理解認同的可能，在她的雙重視點之中，理解別人也就是理解自己。這種觀看結構也出現在〈十字勳章〉（1981），以印籍僱傭兵的視角記述當時港英政府對大陸偷渡客的即捕即解政策，從外人的角度觀看自己的城市，諷刺和反思的力度都更深刻。[86]〈十字勳章〉雖然不是以中國為題材，卻有着和西西其他旅行文本相同的視點的設置和反身觀看的結構，可見在旅行文本中培養出的觀看結構，令作者達到對香港更透徹的理解。

這種旅行與本土互相闡發的觀點，修正了論者過份強調西西的「本土」面向而忽略其「中國性」表現的偏蔽。從文本內容及發表時間來看，其實西西在寫關於中國的文本（如《哨鹿》）同時也在寫探討香港的文本，而且中國認同在殖民歷史語境中是反殖的具抵抗性的身份認同，素葉同人的中國性應該在這個框架下理解。例如《我城》這部香港文學的經典之作，論者競相引用關於「城籍」的一段，卻很少引用此段稍前阿果對中國人身份的認同：「要是有人問我，你喜歡做誰的子孫呢，亞歷山大大帝、彼得大帝、凱撒還是李察獅王，我當然做黃帝的子孫。問的人就說了，在這裏，做黃帝的子孫有什麼好處，你會沒有護照的呀。」[87]〈南蠻〉（1981）也有類似的說法，當時有人質疑香港人到底是

85 西西：〈龍骨〉，《像我這樣的一個女子》，頁 27-36。

86 西西：〈十字勳章〉，《素葉文學》第 4 期（1981 年 12 月），頁 28-31。

87 西西：《我城》（臺北：洪範出版社，1999 年），頁 150。有趣的是，《我城》談「城籍」的第十二章正是講述阿果和麥快樂等一起到香港某離島露營，麥快樂說自己的願望是「到處去走走」，指的卻不是到外地而是足下的香港；而阿果正是在出遊時因為證件問題而引出了「只有城籍沒有國籍」的討論，恰好回應了本文討論的本地／外地旅行問題。

臺灣人文學術期刊資料庫

否純粹的中國人，胡不夷卻說如果可以選擇自己的國籍，會選擇做中國人。[88]〈南蠻〉除了回應民族議題，也寫了很多本地社會的問題，二者不僅不互相排拒，反而共同構成了作者身份認同的立體面貌；只取本土的面向，是論者因應論述需要的選擇。[89]

最後，本文想借西西可以帶出旅行文學的評價問題，並總結素葉同人的遊記特色。在「描寫美文」和「敘事散文」之間，《素葉》較接近「敘事型」。[90]這只是就側重點而言，未可截然二分，他們的詩作往往和其散文一樣側重敘事，或是部份作者蒙西方電影藝術沾溉的緣故。敘事型與描寫型的區別，在遊記上表現得最明顯。「遊記」是結合敘事、寫景、抒情的文類，但《素葉》同人的遊記極少寫景，也不旨在向讀者呈現該地的典型面貌；所謂「敘事型」不是某些暢銷遊記作者般着重情節吸引和戲劇化，[91]反而多從細節和小事着墨，最初或是由於刊於專欄、有字數限制，但即使刊登在《素葉》不受專欄篇幅限制，諸如何福仁〈新疆之旅〉和俞風〈天山和天山的風雨〉等較長的遊記還是以記人事為主。[92]把不同遊記作者比較的話，不難發現側重點大異其趣。例如鄭振偉詳細分析了黃國彬的《華山夏水》及《三峽・蜀道・峨眉》中寫景鋪張的修辭方式，[93]黃康顯也說在描寫同樣景色的文本裏，他的辭彙和形象是最豐富飽滿的。[94]《素葉》同人的遊記不見這種工筆畫的寫法，黎海華指鍾玲玲的遊記「不慣於繪景，卻長於敘事和人物特寫。如散文集第七部『地圖的北面』十二

88 西西：〈南蠻〉（1981），《母魚》（臺北：洪範出版社，1990 年），頁 70、101。

89 陳潔儀最早論及《我城》被論者掩去的「中國」面向。陳潔儀：《香港小說與個人記憶》（香港：天地圖書出版社，2010 年），頁 63-64。

90 對散文類型的討論，參考鄭明娳：《現代散文構成論》（臺北：大安出版社，1989 年）、鄭明娳：《現代散文類型論》（臺北：大安出版社，1988 年）。

91 參考黃康顯：〈香港今日的遊記文學〉，《香港文學的發展與評價》，頁 223。

92 何福仁：〈新疆之旅〉，同註 32，頁 14-16。俞風：〈天山和天山的風雨〉，《素葉文學》第 9、10 期（1982 年 6 月），頁 4-6。

93 鄭振偉：〈黃國彬旅遊散文的崇高感——《華山夏水》和《三峽、蜀道、峨嵋》〉，《中文文學拾論》，頁 32-52。

94 同註 91，頁 227。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篇，是旅遊記事，竟無一篇是專注寫風景的。」[95] 許迪鏘的遊記多速記旅程中的滑稽事，西西和何福仁的遊記穿梭於浩瀚的知識，俞風的遊記則多記內省思考。俞風的遊記算是素葉同人當中描寫成分最多的，卻不講究詞藻華美和經營意象，反而傾向內省，語調抒情。黃康顯認為遊記的「文學性」來自真摯的情感和豐富華麗的詞藻，似乎是暗示鄉愁之文易好。[96] 他的標準較適用於描寫型的遊記，素葉同人向來反對美文，[97] 他們的文學成就也不在於文字華美；另一方面黃康顯的評價標準是一種文學準則，本文所論的超越與否、反思之有無是旅行理論的準則。以美文的標準來看，這些遊記甚至文學性成疑，但如果遊記不以狀物寫景的能力分高下，那麼或者可以改用敘事的剪裁鋪排、「境界」、「視野」等從整體着眼的標準。借用何福仁替西西的散文集《羊吃草》作序的其中一段話總結素葉同人的遊記特色：

> 香港散文的特色，而且是好處之一，也可能是過去跟其他地方的漢語寫作不同之處，即是敘述時一個平視的「我」。追溯起來，這大抵和現實環境有關，……這令我們謙虛，又不得不依靠自己，摸索，琢磨，然後獲得自己的聲音，一種不亢不卑的聲音。[98]

他們自七十年代寫作專欄所習得的親切、平和、生活化的特點也因許多香港作者由專欄起步而滲透成為香港散文特色。[99] 另一方面，雖然旅行理論質疑

---

95 黎海華：〈灰澀背後的燦爛——鍾玲玲散文集《我不燦爛》〉，《文學花園》（香港：基督教文藝出版社，1997 年），頁 127。

96 同註 91，頁 224。又見他對香港散文的討論，他推崇為抒情真切的，恰好都是懷鄉或抒發文化鄉愁的散文，〈評香港的散文創作〉，《香港文學的發展與評價》，頁 193-202。

97 張貽婷：〈「動盪年代」的再回首——專訪《素葉文學》創辦者許迪鏘先生〉，《幼獅文藝》第 682 期（2010 年 10 月），頁 86。

98 何福仁：〈散文裏一種朋友的語調〉，西西著，何福仁編：《羊吃草》（香港：中華書局，2012 年），頁 viii。

99 專欄的世俗形式與五四以來散文對美文的追求格格不入，而且專欄這種文學生產形式使作者與讀者的關係變得平等，參考也斯：〈公眾空間中的個人論說——談香港專欄的局限與可能〉，《香港文化空間與文學》，頁 63-79。另可參考葉輝：〈七十年代的專欄和專欄文學〉，《素葉文學》第 68 期（2000 年 12 月），頁 136-140。

香港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旅人是否可以真正理解當地，[100] 西西卻通過小說超越了旅客的身份、「成為」當地人，面對他們的生活問題，寫出他們的所思所感，[101] 就像德希達（J. Derrida）所說的「變向他者」（becoming-others）。[102] 也斯曾指遊記是作者性情的流露，[103] 如果某些過港文人流露出偏狹的大中原心態，西西等素葉作家卻流露出廣闊的胸襟和中港二元對立框架以外／以前的思維和情感。

## 五、餘論：反面的本土思考

到了九十年代，《素葉》上的遊記在一貫的歷史文化主題上又加入了經濟觀察，諸如甘玉貞〈賣〉（1992）和蜉蝣〈旅程八篇〉（1998）等諷刺中國政經情勢轉變和消費市場發展，[104] 當中對暴起的消費文化的抗拒未嘗不可再從「本真」理論作理解。而與中國相關的小說，其主題由探親、旅遊變成了港人北上工作，記錄了中港關係的新階段。余非〈那一叢叢的灌木林〉（1993）敘

100 例如郝譽翔認為旅行文學中有不可避免的詮釋暴力，突破異文化隔膜非常困難。郝譽翔：〈「旅行」？或是「文學」？——論當代旅行文學的書寫困境〉，東海大學中文系編：《旅行文學論文集》（臺北：文津出版社，2000 年），頁 297。

101 雖然俞風願意直視當地人的生活，卻沒有反映在他的遊記上，他的遊記主要呈現了歷史旅遊的面向，始終沒有越過旅人的自我。比如在〈在鄭州投宿及其他〉（1982），他表示相對於觀光風景，更喜好觀察當地人民。「而我不過是過路的人，一心要尋訪古蹟古城，印證詩詞典籍上的記述。然則商城在、汴梁在、洛陽在、長安在，對廣場上的人們又有甚麼意義呢？難道我不應該切切實實地面對他們，誠懇地閱讀他們的臉，一如閱讀浩瀚的史冊嗎？」雖然他有這樣的願望，然也不得不承認「我只是匆匆的過客，對鄭州、對中原又有多少認識？」〈在鄭州投宿及其他〉，《牆上的陽光》，頁 111-112。

102 胡錦媛率先把德希達的相關說法引入華文旅遊文學討論，見胡錦媛：〈靜止與遊牧——《印度之旅》中的兩種旅行〉，《旅遊文學論文集》，頁 186。

103 也斯：〈遊記的視野與性情〉，《香港文化空間與文學》，頁 80-82。

104 甘玉貞：〈賣〉，《素葉文學》第 39 期（1992 年 11 月），頁 12-13。蜉蝣：〈旅程八篇〉，《素葉文學》第 64 期（1998 年 11 月），頁 50-51。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述者經常需要北上公幹，控訴大陸經濟起飛所造成的社會亂象。[105] 伍淑賢〈香格里拉之一〉（1993）則能超越港人本位的思考，切中肯綮，藉一外國人東尼的口說出中國文革後以來的巨大變化，見證中國和香港的經濟關係逆轉，「中國跟你們香港人想像的不一樣」，並以麥當勞進駐中國的歷史意義作結。[106] 至於中國遊記，九十年代和八十年代相比，數量上雖然大幅減少，卻多了更迫切複雜的情感和政治思考。例如鍾玲玲〈列車〉（1991）寫兩個女子到廣州旅行，暗示比起中國最嚴峻的時候，旅行「和從前相比現在是好得多了。」在她一貫描寫細膩幽微的女子情感糾葛之中，一個女子難以愛上另一女子，這種情感困難同時指中國，「我對中國的情感很難」，因此另一友人對她們竟然在六四後到中國旅行這件事感到難以置信。[107] 遊記內容的轉變側面反映後過渡時期香港和中國在政經社會文化等層面互動大幅增加，香港人對中國的認同卻漸行漸遠了。

作為總結，如果說在臺灣的旅行文學討論裏，本地遊被賦予本土意識的啟蒙作用而相對上貶抑外地遊的價值，[108] 上文的討論卻說明了香港作家不偏袒任何一方。香港文學的「本土性」與「中國性」不必是互相排斥的，畢竟，當我們討論「本土」時，從來都不是、也不能只考慮這蕞爾小島之內的人事物。黃繼持的話扼要地概括了香港本土的開放性，謹引為本文的結語：「六十年代以來香港『本地』成長的一代，他們在香港生活和所思所感，……也不必局限於香港，可以遠及或未親歷的『祖國』或『故園』，可以遐向歐美異域。……本地意識之自覺並不必把香港置於中國與世界相關的考慮之外，……以異地為

105 余非：〈那一叢叢的灌木林〉，《素葉文學》第 47 期（1993 年 10 月），頁 16-19。

106 伍淑賢：〈香格里拉之一〉，《素葉文學》第 48、49 期（1993 年 11 月），頁 30-34。

107 鍾玲玲：〈列車〉，《素葉文學》第 28 期（1991 年 9 月），頁 2-4。

108 宋冬陽（陳芳明）：〈精神版圖的擴張與再擴張：論林文義的旅行文學〉，鄭明娳編：《當代台灣文學評論大系（五）散文批評》（臺北：正中書局，1993 年），頁 395-406。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題材而融入港人感受識見，乃至憑虛構擬而實為香港文人『感性』之一端者，也成為香港文學內容的一部份。」[109] 正如也斯所說：「每次說香港的故事，結果總變成關於別的地方的故事；每次說別的地方的故事，結果又總變成香港的故事。」[110] 旅行的見聞、遊記及由旅行產生的文學文本，其跨地域性豐富了香港文學的面貌，也啟發了不少學術論述，[111] 也斯就是很好的例子，但這已經超出本文處理的範圍，只能存而不論了。

（責任校對：方韻慈）

# 引用書目

## 一、近人論著

也　斯：〈從緬懷的聲音裏逐漸響現了現代的聲音——試談馬朗早期詩作〉，《素葉文學》第 5 期（1982 年 1 月）。

也　斯：〈遊記的視野與性情〉，《中國旅情》，香港：明天出版社，1988 年。

也　斯：《香港文化空間與文學》，香港：青文書屋，1996 年。

中國旅行社總社、中國建設雜誌社合編：《在龍的故鄉：探親與旅遊》，香港：海峰出版社，1987 年。

王一桃：《怎樣寫遊記》，香港：現代教育研究社，1991 年。

王良和：《余光中・黃國彬論》，香港：匯智出版有限公司，2009 年。

王宏志、李小良、陳清僑編：《否想香港：歷史・文化・未來》，臺北：麥田出版社，1997 年。

史書美：《視覺與認同：跨太平洋華語語系表述・呈現》，臺北：聯經出版

109 黃繼持：〈香港文學的主體性的發展〉，《追跡香港文學》，頁 99-100。

110 也斯：〈香港的故事：為甚麼這麼難說？〉，《香港文學 @ 文化研究》，頁 11。

111 參考陳燕遐：《旅行敘事：香港文化的移置論述》（香港：香港科技大學人文學部博士論文，陳麗芬先生指導，2002 年）。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事業有限公司，2013 年。
甘玉貞：〈賣〉，《素葉文學》第 39 期（1992 年 11 月）。
伍淑賢：〈香格里拉之一〉，《素葉文學》第 48・49 期（1993 年 11 月）。
西　西：〈礫石〉，《素葉文學》第 3 期（1981 年 11 月）。
西　西：〈戈壁灘〉，《素葉文學》第 3 期（1981 年 11 月）。
西　西：〈十字勳章〉，《素葉文學》第 4 期（1981 年 12 月）。
西　西著，劉以鬯編：《交河》，香港：香港文學研究社，1981 年。
西　西：《像我這樣的一個女子》，臺北：洪範出版社，1984 年。
西　西：《母魚》，臺北：洪範出版社，1990 年。
西　西、何福仁：《時間的話題：對話集》，臺北：洪範出版社，1995 年。
西　西：《我城》，臺北：洪範出版社，1999 年。
西　西：《西西詩集》，臺北：洪範出版社，2000 年。
西　西著，何福仁編：《羊吃草》，香港：中華書局，2012 年。
李孝忠：〈長江行〉，《素葉文學》第 6 期（1982 年 2 月）。
李瑞騰：〈八十年代香港的新詩界〉，《亞洲華文作家雜誌》第 27 期（1990 年 12 月）。
何福仁：〈新疆之旅〉，《素葉文學》第 3 期（1981 年 11 月）。
阮妙兆：〈導遊〉，《素葉文學》第 4 期（1981 年 12 月）。
貝　類：〈祇是幾句說話〉，《羅盤》第 8 期（1978 年 12 月）。
余　非：〈那一叢叢的灌木林〉，《素葉文學》第 47 期（1993 年 10 月）。
林行止著，駱友梅編：《香港前途問題的設想與事實》，香港：信報，1984 年。
《香港年鑑 1980》，香港：華僑日報，1980 年。
胡晴舫：《旅人》，臺北：八旗文化出版社，2009 年。
胡錦媛編：《臺灣當代旅行文選》，臺北：二魚文化出版社，2013 年二版。
胡錦媛：〈靜止與遊牧——《印度之旅》中的兩種旅行〉，收入東海大學中文系編：《旅行文學論文集》，臺北：文津出版社，2000 年。

臺灣古典學術期刊資料庫

侯如綺：《雙鄉之間：台灣外省小說家的離散與敘事（一九五〇—一九八七）》，臺北：聯經出版事業有限公司，2014 年。

俞　風：〈天山和天山的風雨〉，《素葉文學》第 9、10 期（1982 年 6 月）。

俞　風：《牆上的陽光》，香港：素葉出版社，1994 年。

俞　風：《看河集》，香港：素葉出版社，1994 年。

高馬可：《香港簡史》，香港：中華書局，2013 年。

唐　羚編：《神州心影：中國旅行記》，香港：漢風文藝研究會，1983 年。

馬傑偉、曾仲堅：《影視香港》，香港：香港中文大學亞太研究所，2010 年。

郝譽翔：〈「旅行」？或是「文學」？——論當代旅行文學的書寫困境〉，收入東海大學中文系編：《旅行文學論文集》，臺北：文津出版社，2000 年。

陳智德：《解體我城》，香港：花千樹出版社，2009 年。

陳智德：〈放逐的省思：六十年代的香港新詩〉，《呼吸詩刊》第 6 期（1999 年 2 月）。

陳國球：〈收編香港——中國文學史裏的香港文學〉，收入香港中文大學中國語言及文學系、香港教育學院中國文學文化研究中心合編：《都市蜃樓：香港文學論集》，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2010 年。

陳燕遐：《旅行敘事：香港文化的移置論述》，香港：香港科技大學人文學部博士論文，陳麗芬先生指導，2002 年。

陳潔儀：《香港小說與個人記憶》，香港：天地圖書出版社，2010 年。

張美君、朱耀偉編：《香港文學 @ 文化研究》，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2002 年。

張銳釗：〈關於「遊記」〉，《素葉文學》第 12 期（1982 年 8 月）。

張銳釗：〈根〉，《素葉文學》第 11 期（1982 年 7 月）。

張銳釗：〈夜行列車〉，《素葉文學》第 19 期（1983 年 8 月）。

張銳釗：〈塞上曲〉，《素葉文學》第 20、21 期（1983 年 11 月）。

張貽婷：〈「動盪年代」的再回首——專訪《素葉文學》創辦者許迪鏘先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生〉，《幼獅文藝》第 682 期（2010 年 10 月）。
康　夫：〈夜遊江門〉，《素葉文學》第 1 期（1980 年 6 月）。
許迪鏘：《南村集》，香港：素葉出版社，1995 年。
許迪鏘：〈長城〉，《素葉文學》第 9、10 期（1982 年 6 月）。
許迪鏘：《老師沒有告訴我，我也無從告訴學生的歷史及文學片斷及思考》，香港：進一步多媒體有限公司，2007 年。
許建崑：〈文化現場的再造與迷思——論余秋雨散文二書所表現的文人情懷〉，收入東海大學中文系編：《旅遊文學論文集》，臺北：文津出版社，2000 年。
淮　遠：〈綿羊與 K〉，《素葉文學》第 24、25 期（1984 年 8 月）。
淮　遠：〈尋找江青〉，《素葉文學》第 63 期（1997 年 10 月）。
黃子平：《害怕寫作》，香港：天地圖書出版社，2005 年。
黃思奇等著：《香港社會剖析》，香港：廣角鏡出版社，1984 年。
黃國彬：〈六年辛苦不尋常〉，《第六屆青年文學獎文集》，香港：香港大學學生會，香港中文大學學生會，1979 年。
黃康顯：《香港文學的發展與評價》，香港：秋海棠文化企業出版社，1996 年。
黃繼持、盧瑋鑾、鄭樹森編：《追跡香港文學》，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1998 年。
馮偉才等編：《香港短篇小說選 1984-1985》，香港：三聯書店，1988 年。
楚　真：〈江南山水〉，《素葉文學》第 8 期（1982 年 4 月）。
楊佳嫻：〈離／返鄉旅行：以李渝、朱天文、朱天心和駱以軍描寫臺北的小說為例〉，《中外文學》第 34 卷第 2 期（2005 年 7 月）。
葉　輝：〈七十年代的專欄和專欄文學〉，《素葉文學》第 68 期（2000 年 12 月）。
蜉　蝣：〈旅程八篇〉，《素葉文學》第 64 期（1998 年 11 月）。
廖文傑：〈人物五題〉，《素葉文學》第 13 期（1982 年 10 月）。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黎海華：《文學花園》，香港：基督教文藝出版社，1997 年。

鄭明娳：《現代散文類型論》，臺北：大安出版社，1988 年。

鄭明娳：《現代散文構成論》，臺北：大安出版社，1989 年。

鄭明娳編：《當代台灣文學評論大系（五）散文批評》，臺北：正中書局，1993 年。

鄭振偉：《中文文學拾論》，香港：天地圖書出版社，2000 年。

鄭樹森：〈香港在海峽兩岸間的文化角色〉，《素葉文學》第 64 期（1998 年 11 月）。

蔡榮芳：《香港人之香港史 1841-1945》，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2001 年。

劉兆佳：〈「香港人」或「中國人」：香港華人的身分認同 1985-1995〉，《二十一世紀》第 41 期（1997 年 6 月）。

劉細良：《帶著偏見去旅行》，香港：上書局，2007 年。

鍾怡雯：〈故土與古土：論台灣返鄉散文〉，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文學系編：《解嚴以來台灣文學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臺北：萬卷樓圖書公司，2000 年。

鍾怡雯：《亞洲華文散文的中國圖像（1949-1999）》，臺北：萬卷樓圖書公司，2001 年。

鍾玲玲：〈列車〉，《素葉文學》第 28 期（1991 年 9 月）。

（英）艾倫・狄波頓著，廖月娟譯：《旅行的藝術》，臺北：先覺出版社，2002 年。

（英）約翰・厄里著，葉浩譯：《觀光客的凝視》，臺北：書林出版社，2007 年。

James Clifford, *Routes: travel and translation in the late twentieth century*,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7.

Jonathan Culler, “The Semiotics of Tourism,” in *Framing The Sign: Criticism and Its Institutions*, Norman: University of Oklahoma Press, 1988.

（**說明**：書目前標示＊號者，已列入 Selected Bibliography）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 Selected Bibliography

Cheung, E. M.-K., & Zhu, S. Y.-W. (Eds.). (2002). *Xiang gang wen xue @ wen hua yan jiu* [*Hong Kong literature as/and cultural studies*]. Hong Kong: Oxford.

China Travel Service, & China Reconstructs (Eds.). (1987). *Zai long de gu xiang: Tan qing yu lü you* [In the homeland of dragons: Visiting family and traveling]. Hong Kong: Hai Feng.

He. F.-R. (1981, November). Xin jiang zhi lü [A trip to Xinjiang]. *Su Yeh Literature, 3.*

Hou, J.-Ch. (2014). *Shuang xiang zhi jian: Tai wan wai sheng xiao shuo jia de li san yu xu shi (1950-1987)* [Between two homelands: The scattering and narratives of Taiwanese novelists of mainland China descent]. Taipei: Linking.

Huaiyuan. (1984, August). Mian yang yu K [The sheep and K]. *Su Yeh Literature, 24 & 25.*

Huang, K.-X. (1996). *Xiang gang wen xue de fa zhan yu ping jia* [The development and evaluation of Hong Kong literature]. Hong Kong: Qiuhaitang.

Xixi. (1984). *Xiang wo zhe yang de yi ge nü zi* [A girl like me]. Taipei: Hung-fan.

Xu, D.-Q. (1995). *Nan cun ji* [A collection of Xu Di-Qiang's prose works]. Hong Kong: Su Yeh.

Yesi. (1996). *Xiang gang wen hua kong jian yu wen xue* [Hong Kong cultural space and literature]. Hong Kong: Youth Literary.

Yu, F. (1994). *Qiang shang de yang guang* [The sunshine on wall]. Hong Kong: Su Yeh.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